

张岱年全集

—增订版—

中国哲学大纲

下

张岱年 著



哲學家須有求一致而客觀真理之誠心，即須充分的重視，考量其其他哲學家的見解，或依他家的方法試證一次，如知考量他家所得的結果的品質，或視他家學說，即失其哲學家之任何

理論，不
容納之，更
且摧折且掃除，且吸納且掃蕩。

任何哲學家的工作，都不至於是完全浪費，毫無所得，其錯誤中的正確，實應辨識而吸取之。在哲學的戰鬥中

中華書局

张岱年全集

—增订版—

中国哲学大纲

下

張岱年 著

最的客觀真理之誠心

客觀的見解，或係他家

的的錯誤的品性，最粗

陋亦集委，都必有所以

非之，而亦應求其具

也。實于任何哲學，起

以故始且終焉。

五件，而不至於是空之

：其錯誤之非正解，實應辨論而吸取之。在有學的戰鬥中

下

中華書局

第三篇 人生理想论

简引 人道与人生理想

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是人生论,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。人生理想论即是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。

人生理想论发生最早,创始于孔子。孔子及墨子的哲学之主要部分,便是人生理想论。他们既没有特殊的宇宙论,也没有特殊的人性论,他们一生所辛苦唱导的,是人生之当然准则和与其联属的政治理想。人生理想,古代称为人道。人道之观念发生甚早,在孔子以前即已有之。如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载子产云:“天道远,人道迩。”在《论语》中,所谓“道”,即专指“人道”。

宇宙论中所谓道,有所以然之意。在人生论,所谓道,有当然之意。但“当然”一词,发生颇晚。最初所谓“义”,即指应当或当然。在孔子,道与仁,只是一事,亦称为义。从其为原则谓之道;从其为当然谓之义;而道之内容便是仁。墨子所谓“义”,与所谓

“人民之大利”、“兼爱”是一事。兼爱即舍一己之私利而谋人民之大利，此即是应当，即是义。至宋代，“当然”一词，乃稍流行。清代戴东原则以“必然”为当然之名称。

人生之最高准则，可以名为“人生理想”。“理想”一词，乃中国过去哲学中所无有。将中国哲学家所讲的人生最高准则，名为理想，亦非完全恰适，但较易于理解。故今将中国古代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，称为人生理想论。

人生理想论，实是中国哲学之核心部分。中国哲学在此方面的贡献，亦较大。中国哲人，关于人生之最高准则，实可谓有比较丰富渊闳、博大精深的理论。

【附注】本书旧版此篇题为“人生至道论”，至道一词过于陈旧。今改题为“人生理想论”，并将原写的“简引”略作删改。

第一章 仁

第一个提出人生理想的，是孔子。孔子以仁为人生理想。仁的观念，所涵甚广，而本旨甚约；境界极高，而平实简易：是一个宏大而切近的生活准则。一般都认为孔子不曾确切的说出仁的意谓，以为孔子弟子问仁，孔子所答，都是因材施教，随宜指示，故所说都是仁的片断，而不曾总括的说出仁的整个意谓。其实不然，孔子实曾明白的给出仁之界说。《论语》云：

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（《雍也》）

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便是孔子所规定之仁之界说。以此二句为孔子所定仁之界说，理由有三：第一，一般问仁，孔子都是就各人之程度予以指点，仅说仁的一方面，以便易于实行。今子贡既说出较仁更高的境界，而误认为仁，则孔子自不得不说出仁之全义，以见仁之全义尚不及此境界，而不能仅只说出仁之一片断了。第二，“夫仁者”三字，颇似立界说的形式，它处论仁，皆不用夫字。第三，《论语》中其余言仁各条，含义都不若此条之深广，其意旨都不出此条之范围。所以此条所说，是可以看作孔子所讲仁之界说的。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，是圣的境界，较仁为高。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乃是仁的本旨。“立”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；“达”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。自己求立，并使人亦立；自己求达，并使人亦达：即自强不息，而善为人谋。简言之，便是成己成人。“能近取譬”，则是为仁的方法，即由近推远，由己推人；己之所欲，亦为人谋之，己之所不欲，亦无加于人。【注一】

【注一】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是孔子所定仁之界说，实无可疑。以此为界说，以观《论语》言仁各条，则无有不通，且各显深义。仁之本旨，只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可见孔子所谓仁者，如何平实而非玄虚，如何明确而非侷侷；切近简易，而又宏伟广大；统涵诸德，而不失自为一德。后人惟不知孔子自有仁之界说，而谓孔子一生未尝说出仁之确旨，乃自己为仁字另定界说。结果或失之玄虚，或失之侷侷，或失之肤泛，或失之琐碎；且皆于《论语》言仁各条或合或不合，牵强比

附,终不可通。皆由不知孔子本有仁之界说。

又按:《论语》曾云:“子罕言利,与命,与仁。”(《子罕》)今《论语》中所载言仁者数十条,在《论语》中不为罕见。何以谓之罕言?大概孔子论仁之语,弟子皆宝贵之,皆记录之,而论它事之语,则或记或不记。今《论语》中言仁处多,非言之多,乃记之多。孔子一生数十年,言仁数十次,实不为多也。

仁之本旨,是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所以根本上是爱人的。《论语》云:

樊迟问仁,子曰:爱人。(《颜渊》)

但孔子言爱,注重有实益于人。孔子曾说:

爱之能勿劳乎?忠焉能勿悔乎?(《宪问》)

所以仁不仅是爱而已,并且仁者有时亦恶人。孔子说:

惟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。(《里仁》)

我未见好仁者、恶不仁者。好仁者,无以尚之。恶不仁者,其为仁矣,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(同上)

仁者本爱人,而对于不仁之人,则不得不恶之,使其不得影响自己。惟仁者为能得好恶之正。可以说仁乃“爱仁以德”,而非“姑息之爱”。仁乃欲成己成人,然姑息之爱,或反足以误己误人。故仁虽包含爱,而不是单纯的爱。

仁以己立而立人为要,而求“立”必须循礼。孔子曾说:

不知礼,无以立也。(《尧曰》)

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（《泰伯》）

所以实行仁德，必自约以礼。《论语》云：

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！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！（《颜渊》）

“克己复礼”，便是以礼自律，自约其身，使合于礼；视听言动，莫不循礼。必如此，方能自立而立人，所以是为仁之方。《论语》又云：

仲弓问仁，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仲弓曰：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！（同上）

“如见大宾”，“如承大祭”即是恭敬循礼。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，便是天下归仁。《论语》又云：

樊迟问仁，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（《子路》）

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，也便是“克己复礼”。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即所谓恕。“与人忠”，即所谓忠。忠恕即“能近取譬”之道，皆仁之一方面。孔子甚注重恕。《论语》云：

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（《卫灵公》）

恕是一个根本的生活准则。《论语》又云：

子曰：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！曾子曰：唯！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（《里仁》）

曾子以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，忠恕即仁。忠是尽己之心力以助人，恕是不以己之所恶施于人。忠是积极的，恕是消极的。合忠与恕，便是仁。《论语》又云：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请问之，曰：恭，宽，信，敏，惠。（《阳货》）

恭即循礼；宽信敏惠，乃忠恕之所含。宽信是恕，敏惠是忠。

仁是“立人”“达人”，所以必须实际有益于人，方称为仁。如仅洁身自好，无害于人，尚不足为仁。《论语》云：

宪问……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！（《宪问》）

“克伐怨欲不行”固为难能，但实非有助于人，所以未足为仁。并且仁乃己“欲”立而立人，己“欲”达而达人，乃是因己之所欲，以推人之所欲，仁不是要无欲。

仁是立人达人，故为仁必须真诚实在的力行；不能真诚实在的力行，则既不能自立自达，更不能立人达人了。所以仁又包含力行不作虚言的意思。《论语》云：

问仁，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（《雍也》）

司马牛问仁，子曰：仁者其言也切。曰：其言也切，斯谓之仁矣乎？子曰：为之难，言之得无切乎？（《颜渊》）

仁者惟真实力行,不肯取巧,亦不肯多言;不避难而就易,更不事空谈。《论语》又云:

子曰:……仁者必有勇。(《宪问》)

《中庸》亦述孔子之言云:

力行近乎仁。

必能力行,方能为仁。故仁者必勇,无勇则根本不能为仁了。孔子又说:

巧言令色,鲜矣仁!(《学而》)

刚毅木讷近仁。(《子路》)

刚毅木讷,则能真实力行,故近仁。巧言令色者,不欲真实力行,而欲以巧伪赢得人心,实非有意立人达人,故远于仁。

仁者实必有所作为,虽然不能“博施于民,而能济众”,但必有立人达人之行为。孔子所认为仁者,皆实际有过人之表现的。孔子对当时人皆不许为仁者。其所许为仁人者,是微子、箕子、比干、伯夷、叔齐及管仲。此数人都是能真实力行,而有非常之表现者。孔子称管仲“民到于今受其赐”,以管仲能推其立人达人之心,不轻于死而图有以利民,故谓之为仁。

人莫不欲立,人莫不欲达,只要能推己及人,自己求立达,而亦助人立达,便是仁。所以仁是平实简易的。孔子以为行仁实不难,人人皆可实行。孔子说:

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?我未见力不足者。盖有之矣,我未之见也。(《里仁》)

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（《述而》）

人人皆有力助人，所以人之不为仁，并非力不足，只是有力而不用。人只要去其自私之心，而真实的力行忠恕，便是仁。

孔子对于仁极其重视，认为仁是不可须臾离的行为准则，虽在危难急遽之时，亦不可违仁。孔子说：

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（《里仁》）

为求仁，更可以死赴之。孔子说：

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！（《卫灵公》）

达到仁的境界，生活方为有价值；不能仁，则其生活实无价值。宁为求有价值之生活而死，虽死而得到不朽；否则虽生亦无意义。生活之性质上的提高，比其数量上的延长，远为重要。

真能行仁，真能达到仁的境界，便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快乐，一切恐惧烦懣，都已消灭，惟一种快慰充满了内心。仁的生活，乃是一种至极快乐的生活。孔子说：

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（《里仁》）

仁者不忧。（《子罕》）

能仁则无人而不自得，内省不疚，毫不忧闷。孔子又说：

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。

（《里仁》）

惟仁者为能久处约而不滥，久处乐而不淫，健行不息，自有常则，

而不随环境转移。

仁的本旨,是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此意谓的仁,总以上所述,可以说含括三方面:一忠恕,二克己复礼,三力行。忠恕是由内心以推己及人;克己复礼则是以社会之行为规范约束自己;而忠恕与克己复礼皆以力行为基本。克己复礼亦正是行忠恕之道,对人尽礼,也便是尽忠尽恕。

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是仁的中心意谓。此意谓尚可加以更进的解析:一,仁是一方自强不息,一方助人有成,是人己兼顾的。二,仁可以说包含对别人的尊重。三,仁是由己及人,仍以自己为起点。四,仁固包含情感上的爱,乃物质生活上的扶助,而更注重道德上的励导。仁固注意别人生活的维持,而更注意别人道德的提高。仁者对于别人的爱助,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有德行有成就的人。

此种意谓的仁,是生活之最高的道,也是最高的德。德与道是相联系的,有得于道谓之德。最高的德,便兼涵诸德,诸德皆此最高的德之一要素,或达到此最高的德之途径。仁兼涵诸德,如忠、恕、礼、恭、敬、勇等。但仁非全德之名。所谓全德之名,即诸德之总称。而仁非诸德之总称,其本身亦自为一德。不过是最高的德,所以兼涵诸德。根本的原则,涵蕴较小的原则;同例,最高的德,亦涵蕴较低之德。

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,不玄远,无神秘,而有丰富义蕴。孔子对于中国思想之贡献,即在阐明仁的观念。

孔子又尝说:

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(《述而》)

道之主要内容即是仁，德是行道而得诸己，德不仅是仁，而仁是最高的德。艺即礼乐，乃为仁之具。四者分之各有所指，合之有其统一。

孔子又甚注重“义”的观念。所谓义，即是宜，即是当然、应该之意。孔子认为人须依义而行，即人的行为须合乎当然的准则。应该作者，即作；不应该作者，便不作。只须问事情的应该不应该，不可顾念一己的私利，孔子说：

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（《里仁》）

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（《为政》）

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（《里仁》）

君子处世，无所必从，无所必违，惟以义为表准。见应该作者即勇为之，而不顾虑个人一时之利害。

义即当然的准则，而此当然准则之内容为何？实即是仁。仁便是人生之最高的当然准则。依义而行，实即是依仁而行。所以，在孔子，仁与义不是并立的二德，而只是一事。在孔子，义的观念，实与道、德、善等观念同列，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德。孔子尝说：

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（《述而》）

义与善的意思甚为相近。义与善之内容，便是仁。到孟子，乃以义为一德，与仁并立了。

孔子又重“知”，常以仁知并举。孔子云：

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（《里仁》）

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（《雍也》）

最高之人格为圣者，其次为仁者，又其次则为智者。仁者安于仁，智者则知仁为利而行之。《论语》又云：

子曰：“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居，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。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。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。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（《阳货》）

仁可有愚之失。孔子又云：

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（《雍也》）

知者利于仁而行之，由知之而进于好之，乐之，便能安于仁，而为仁者了。【注二】

【注二】仁为最高之德，而兼统诸德，但孔子未尝以知为一德，故仁之中，实不涵知，而可以失于愚。《论语》尝载：“子张问曰：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。焉得仁？”（《公冶长》）或据“未知焉得仁”一句，以为仁包涵知。案：此句实与“不知其仁也”（同篇），“仁则吾不知也”（《宪问》）同意，并非谓既未有知，岂得为仁。仁实不包知。

仁且知，而有大功于人众，便是圣人。圣之境界，在仁之上。《论语》云：

子曰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公西华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（《述而》）

前引孔子答子贡之问，以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为圣。孟子尝述孔子子贡之事云：

昔者，子贡问于孔子曰：夫子圣矣乎？孔子曰：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，而教不倦也。子贡曰：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！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

子贡以仁且智为圣，或亦根据孔子之言。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，亦可谓仁智之极。圣并非一德，而是完全人格之称。德无不备，明哲绝伦，而能拯济生民，乃称为圣。圣是最高人格之名称，而非生活的准则。

孟子发挥孔子的思想，亦以仁为人生之第一原则；而又极注重义，仁义并举，以为生活行为之基本准衡。孔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仁，孟子哲学的中心观念则是仁义。孟子讲仁，大意与孔子相近，但多从心性方面来讲，以为仁即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之发展。孟子说：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……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……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（同上）

不忍人之心，或恻隐之心，以今日的名词来说，即是同情心。人莫不有同情心，同情心即仁之萌芽。发展扩充固有之同情心，即可

达到仁。孟子更以为人皆有所爱，扩充其爱，并其本所不爱者而亦爱之，便是仁。孟子说：

仁者以其所爱，及其所不爱；不仁者以其所不爱，及其所爱。（《尽心下》）

仁即是由近推远，乃同情心之发展，亦可以说是爱之扩充。孔子以“能近取譬”为求仁之方，孟子亦以努力推己及人为求仁之道。他说：

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（《尽心上》）

求仁在于强恕，勉力实践恕，久之便自能达到仁了。孟子又以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，人必实践仁，方成其为人。仁乃是做人的道德。孟子说：

仁也者人也，合而言之道也。（《尽心下》）

仁是总合而言之道。为人之道，析之有几，总合言之，只是一个仁而已。仁是最高的总原则。

仁固是第一原则，尚有第二原则，就是义。仁与义都是基本的实践准则。孟子说：

仁，人之安宅也，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（《离娄上》）

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（《告子上》）

仁是人之所以存心；义是人所必由之路。孔子言仁，注重行为，仁是行为之准则；孟子言仁，则颇注重内心态度，仁是内心所当有之

态度,义方是行为所应循之准绳。孔子所谓义,只是当然之意;孟子所谓义,则是自己裁制之意,不顾一己利害,决然毅然自己裁制其行为,便是义。孟子以不忍说仁,以不为说义。孟子说:

人皆有所不忍,达之于其所忍,仁也。人皆有所不为,达之于其所为,义也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,而仁不可胜用也。人能充无穿窬之心,而义不可胜用也。(《尽心下》)

不当为则不为,当为则为之,便是义。孟子更就人伦讲仁义,以为仁的基本是亲亲,义的基本是敬长。他说:

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,无不知爱其亲者;及其长也,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仁也,敬长义也。无他,达之天下也。(《尽心上》)

推其亲亲敬长之心于天下,便是仁义了。仁之发端是亲亲,但仁不仅是亲亲。孟子又说:

君子之于物也,爱之而弗仁;于民也,仁之而弗亲;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(同上)

知者无不知也,当务之为急。仁者无不爱也,急亲贤之为务。尧舜之知,而不遍物,急先务也。尧舜之仁,不遍爱人,急亲贤也。(同上)

合而言之,仁包含亲与爱;分而言之,则仁亲爱各有限界。对物只是爱之而已;对人则不仅爱之,而更行忠恕;至于父母,则又不仅行忠恕,而更亲之。泛言之,亦可以爱言仁,仁是无所不爱的,但实际上则不能遍爱一切人,而以亲贤为先。

孔子言杀身成仁,孟子则言舍生取义。孟子说:

鱼我所欲也,熊掌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有甚于生者,故不为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恶,所恶有甚于死者,故患有所不辟也。(《告子上》)

所欲有甚于生者,即是义。所恶有甚于死者,即是不义。为实行义,虽牺牲生命亦所不顾。当为之事,虽杀身亦为之;不当为之事,虽受死亦不为。义实在生之上,虽死而能取得义,便已得到不朽的生命。

实行仁义之极,便能毫不勉强,自然合于仁义。孟子说:

舜明于庶物,察于人伦,由仁义行,非行仁义也。(《离娄下》)

能达此境界,便是圣人。孟子说:

规矩,方员之至也;圣人,人伦之至也。(《离娄上》)

圣人便是实行人道、圆满无憾的。孟子又有践形之说。他说:

形色天性也。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(《尽心上》)

天性皆由形色而显现,无形色亦无以见天性。使形色皆为天性之表现,此乃道德修养之极致,如此方为践其形,如此其形体方可谓得到充分之发展。

能至形色天性之境界,便达到生活之最高境界了。最伟大的人格,亦称为大丈夫。孟子说: